

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

校訓

容庚文集

曾憲通 編



● 中山大學出版社

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

曾憲通 編

容庚文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容庚文集 / 曾憲通編. —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4. 11

(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

ISBN 7-306-02386-1

I. 容… II. 曾… III. ①容庚—文集 ②漢字: 古文字—文集
IV. H12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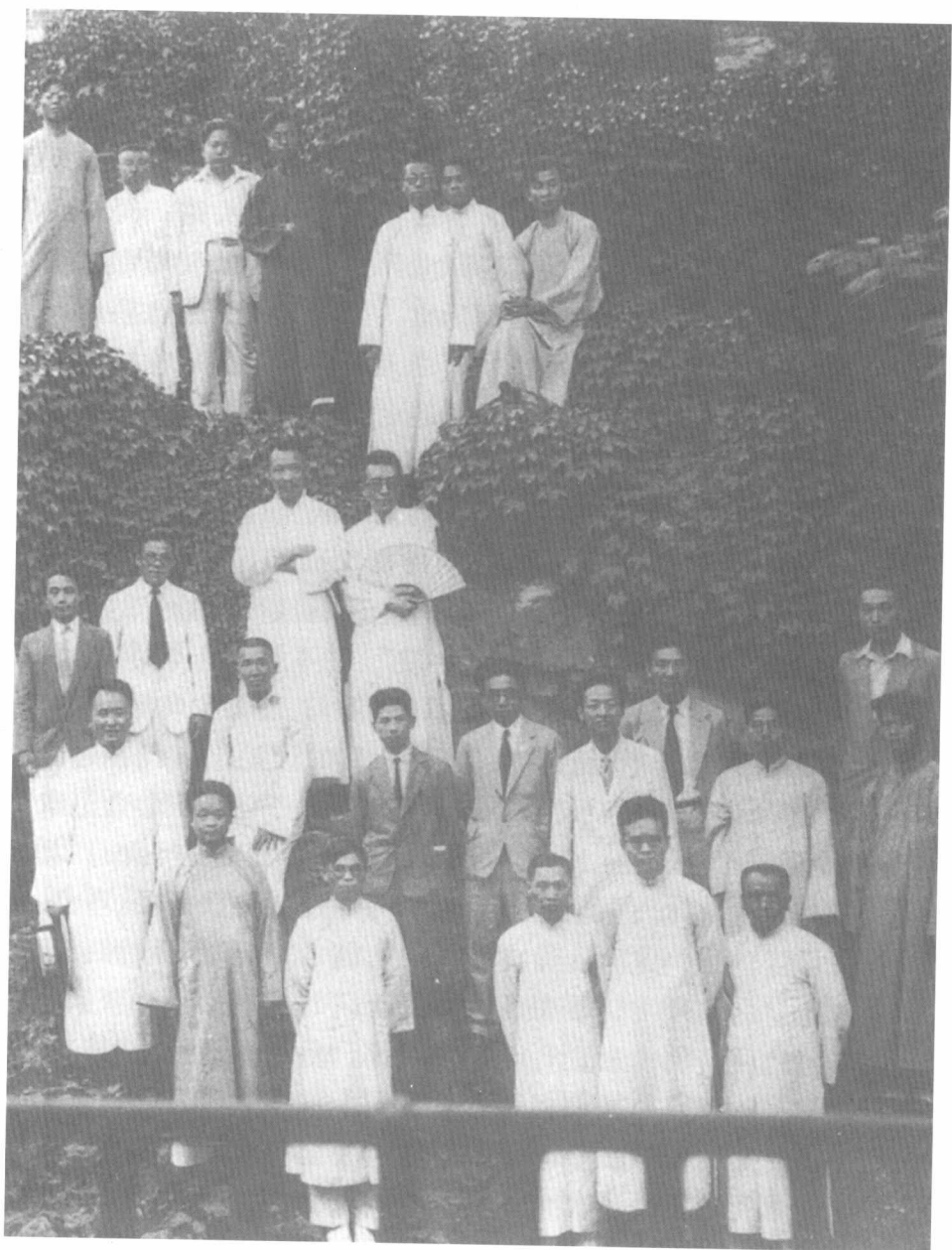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74380 號

責任編輯	裴大泉
裝幀設計	方楚娟
責任校對	莫 文
責任技編	黃少偉
出版發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編輯部電話(020)84111996, 84113349
	發行部電話(020)84111998, 84111160
地 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 編	510275
傳 真	(020)84036565
印 刷 者	廣東南海系列印刷公司
經 銷 者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
規 格	635mm×960mm 1/16 43.5 印張 58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92.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 請與承印廠聯繫



容庚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八三年)



三十年代初，北平學者在北海靜心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所址）歡迎蔡元培時留影（局部。最後排：左一丁山、左三傅斯年、左四顧頡剛、左六陳槃；中持扇者胡適；前第二排：右三趙元任、右六倚石坐者容庚；最前排：右二羅常培、右五董作賓、右六李濟）



五十年代初，與家人合影于嶺南大學西南區五十四號（故居）花園中（現中山大學幼兒園址東面）



七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鄭德坤率團來訪中山大學。期間，與昔日燕京大學的老師容庚（中）晤談于黑石屋貴賓室。左坐者為梁釗韜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第二屆年會在廣州市流花賓館北樓七樓召開。容庚（中）與顧鐵符（左一）、胡厚宣（左二）、徐中舒（右二）、商承祚（右一）在會間留影



八十年代初，容庚和商承祚與學生在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住宅前留影

“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總序

黃達人

在中山大學建校八十周年之際，“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出版了。將我校已故傑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已發表和未發表的著作結集出版，這是我們對先賢表達敬意的一種方式，也是我們作為後學的責任。

中山大學八十年的光榮歷史，是廣大師生追求真理與光明，參與社會變革，推動社會進步的歷史；是歷代學人引進、創新、傳播現代科學和文明的歷史；是傑出學人輩出、人才培養繁盛、教學科研精進日新的歷史。在中山大學的發展史上，鑲嵌着一代又一代著名學人的名字，陳寅恪等一批人文大師以他們在文、史、哲等各領域的宏大建樹，奠定了中山大學人文學科的學術傳統，也奠定了中山大學作為中國名校的地位。

在為學上，他們不計名利得失，視學術為天下公器，以學貫中西的遠見卓識不遺餘力地吸收新知識、新觀點，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

在為人上，他們不侮食於自矜，不曲學以阿世，忠於良知，敢於堅持。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陳寅恪先生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精神的閃光。

他們的精神隨着他們的著作在世間不息地流傳，隨着時間的流逝，披沙見金，更見珍貴。

文庫中所收的著作，在學術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時間已經證明，它們是薪火承傳的中國文化的座座豐碑。這些著作中所體現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乃至學術規範，更是後學者得窺學術門徑、走上學術道路的指南之針。

在這些著作的字裏行間，透露着著作者鮮明的學術個性，同時又有着幾乎完全相同的共性，就是它們無不體現了一種一以貫

之精神：對學術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對人生永不放棄的勇氣。

這種一以貫之的精神，為中山大學營造了良好的學風，豐富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學術傳統，積聚成我們這所大學珍貴的精神財富，給我們這些後學者以無盡的精神力量。

因陳寅恪先生的文集早前已出版多種，尊重陳先生女公子的意見，本文庫沒有編入陳寅恪文集。但我校蔡鴻生教授新近出版了《仰望陳寅恪》一書以及中山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陳寅恪詩詞箋證》一書，可以彌補這一遺憾。

中山大學的理科和醫科同樣是大師雲集、羣星燦爛，理科和醫科的傑出學者文庫也將在適當的時候出版。

我深信，這次出版的“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必可嘉惠學林，裨益後世。

是為序。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於康樂園

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學術貢獻

曾憲通

容庚先生原名肇庚，字希伯，又作希白，號頌齋。一八九四年九月五日生於廣東東莞，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在廣州辭世，享年九十歲。先生畢生著書二十餘種，論文及其它述作近百篇，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和書法篆刻家，又是傑出的書畫鑒賞家和收藏家。下面分三個方面略作介紹。

家世與經歷

容庚先生出身於晚清書宦門第，世代皆習舉子之業。高祖廷華，道光辛卯歲貢生；曾祖保民，道光丙午科舉人；祖鶴齡，同治癸亥恩科進士；外祖父鄧蓉鏡，同治十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父鄴南，光緒丁酉科拔貢，其為人志氣明決，博聞強記，喜治史學，雅習詞章，藏書萬卷，惜年三十七即謝世。先生十五而孤，直接給他以親炙的是四舅鄧爾雅和從叔容祖椿。鄧爾雅是廣東有名的書法篆刻家，容祖椿工於繪畫。先生從小就受到長輩學術與藝術的熏陶，這對他一生的治學影響極大。

一九一三年，當先生還在中學念書的時候，就已經對金石文字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在研習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和桂馥的《繆篆分韻》時，即萌發補輯之意。一九一七年中學畢業，不復升學，與弟妹共同策劃採集篆籀之見存者為《商周秦漢文字》一書，擬分為甲文、金文、石文、磚文和陶文等八大類，《金文編》就是其中最早完成的稿本。一九二二年先生考上北平朝陽大學，路過天津，挾《金文編》稿本謁見了當時著名的考古學家羅振玉，深得羅的賞識，羅說《金文編》正是他自己“欲做而未成者”，再三叮囑“務

竟其成”。並推薦他見北京大學馬衡和沈兼士教授，先生遂於一九二二年秋進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當研究生。一九二五年完成《金文編》的撰集工作，初版由天津貽安堂印行。一九二六年留任北京大學講師，翌年轉入燕京大學任襄教授。就在此時，廣東大學以重金邀聘先生任教授；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爲了表示挽留，也越級擢升先生爲教授。先生鑒於學術研究的條件北方勝於南方，便決意繼續留在燕大工作，主編《燕京學報》。從一九二七年起，先生兼任北平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有機會接觸青銅器原物，手自摩挲，辨僞經驗日進，出版《圖錄》多種。一九二九年夏，郭沫若自日本以“未知友”名義來函，與先生訂文字之交，先生源源不斷以珍貴資料見假，成爲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一九三四年六月，先生與友人發起組織金石學會，後易名爲考古學社，先生親任執行委員，編輯出版《考古學社社刊》，對當時的文物考古調查和研究，直接起了推動的作用。在此期間，先生以八年時日，專事商周青銅器的綜合研究工作，終於在一九四一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這部劃時代的巨著，由哈佛燕京學社印行。緊接著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關門，北京淪陷於日寇。先生因不忍離棄多年積聚的圖書彝器和六個兒女，留在北京大學教書。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對淪陷區教授一律予以解聘。其時李宗仁正在創辦廣西大學，先生遂接受廣西大學教授聘約。一九四六年春，先生乘北平行營飛機經重慶到柳州，適逢西大以校舍之故罷課，先生便決意離開廣西大學回到廣州。旋接受嶺南大學之聘，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主編《嶺南學報》。一九四七年復北上攜家眷南歸，圖書、彝器不無損失，但仍堪稱嶺南藏家之冠。新中國成立後，先生繼續執教於嶺南大學。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入中山大學，任中文系教授，直至逝世。

學術成就

容庚先生的學術成就，概括而言，可分爲北方和南方兩個時期。

容先生在北方工作的二十餘年，是他在學術上從初露鋒芒到大顯身手的時期。先生同鄉好友、著名歷史學家張蔭麟教授曾經精闢地指出：先生“少年即醉心於金石之學，壯而彌篤，由文字而及器物，進而及於史跡”。現分文字、器物、史跡及碑帖書畫收藏四項略加評述。

（一）以金文為中心的古文字學

容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古文字學的奠基者之一，其研究領域遍及甲骨文和金文，而以金文為重點，旁及秦漢文字。他先後寫過《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一九二三）、《甲骨文講義》（一九二七）、《中國文字形義篇》（一九三二）、《殷契卜辭》（一九三三）、《鳥書考》（一九三四）、《秦始皇刻石考》（一九三四）、《金文編》（一九二五）和《金文續編》（一九三五）等，而以《金文編》為其成名之作。《金文編》是我國第一部專科性的金文大字典。此書收字盡據拓本，分別部居悉依《說文》，疑似或不識者則為“附錄”待問。由於它充分吸收了吳大澂《說文古籀補》的優點，在內容和體例上都有所創新，是一部取材宏富，摹寫準確，體例精善的大型工具書。王國維稱“其書祖述中丞而補正中丞書處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因而深受學術界的推崇。隨後出版的多種古文字字書，無一不在《金文編》的影響下而蔚為大觀的。半個世紀以來，隨著考古的新發現和識字水平的提高，先生先後對《金文編》作過三次重大的修改和增訂，一直是古文字學者案頭必備之書。幾乎沒有一個研究古文字的人不從這部名著中獲得教益的。歷史證明，《金文編》至今還是一部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極高的著作。

（二）以青銅器為重點的考古學

商周青銅器一直是先生著力研究的重點。他有感於清代金文真偽雜糅對研究工作帶來的消極影響，開始有選擇地清理傳世青銅器。他一方面著手釐清前代流傳的青銅器圖籍，製《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撰《宋代吉金書籍述評》；另一方面，憑著他在古物陳列所積累的辨偽經驗，去偽存精，編製譜錄。先後編印了《寶蘊樓彝器圖錄》（一九二九）、《秦漢金文錄》（一九三一）、《頌齋吉金圖錄》（一九三三）、《武英殿彝器圖錄》（一九三四）、《海外吉金錄》（一九三五）、《善齋彝器圖錄》（一九三六）等，總計達八百多

件，都是從衆多的銅器中去偽存真、去粗存精地逐件篩選出來的。在細心爬梳書面材料和實物資料的基礎上，先生更著手於青銅器整體理論和結構體系的研究，掌握其形制、花紋和銘辭的流變，觀其會通，終於在一九四一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這部開創性的巨著。此書分上下兩編：上編“通論”是關於青銅器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下編“分論”按類繫器，逐器辨析。文中插圖二百多幅，圖版收器一千餘件，洋洋數十萬言。這部鴻篇鉅製是先生充分吸收宋清兩代金石學研究的成果，並益以近代考古學的成就而集大成者。它的出版，標誌著青銅器研究由舊式金石學進入近代考古學的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半個多世紀以來，至今還沒有一部研究青銅器的同類著作能夠像它這樣全面和系統，充分顯示它具有無與倫比的科學價值。

（三）以考訂史實爲目的的考據學

商周青銅器可據其形制、花紋大體推斷其年代，而銘文則可以考訂其史實。商代銅器銘文簡樸，一般祇兩三字，最長也不過五十字，故作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素材仍以甲骨文為主，而以金文為輔。周代銅器之有銘者已多至數千，銘文也較長。二百字以上的銘文為數不少，百字以上的更多。其內容大率記載作器的緣由，是古代重要史實的記錄。這在當時是歷史的真蹟，在今天則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史料，既可補充史籍的失載，還可訂正其傳抄的訛誤，具有書史的價值。容先生將專贈為記載史實而鑄器的內容分為六類，即祭祀典禮、征伐紀功、賞贈錫命、書約劑、訓誥臣下、稱揚先祖等。先生通過文字、器物以考訂史實之事，試舉數例說明之。

其一，在鳥蟲書未被認識以前，宋清兩代學者都把它們看成是夏代或商代的器物，甚至認為是偽器。上世紀三十年代容先生連續發表《鳥書考》及再考、三考，考訂它們是春秋戰國時期流行於吳越及楚蔡等地的一種特殊美術字，使這種形體詭異的怪字得到正確地通讀，恢復其歷史的原貌。郭沫若在《越王鐘考釋》中說：“舊於‘戊王’二字釋為‘既望’，文例乖戾，因疑其偽。近時容庚始發明其讀，知為越器。”

其二，一九四二年先生於估人處獲見新出之“樂書缶”，愛不

釋手，遂斥巨資購買。此缶器形最早見於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銘文照片著錄於于省吾先生的《商周金文錄遺》，缶之蓋及腹頸皆有錯金銘文，共四十八字。據先生考證，銘文中的“欒書”，即見於《左傳·成公二年》“將下軍”的欒書。並指出：“欒書一稱欒武子，一稱欒伯，以魯成公二年（前五八九）將下軍，從卻克敗齊於鞌，四年將中軍，十六年敗楚於鄢陵，幾射殺楚共王，十八年卒。執政凡十四年。這是他所鑄的器。”但容先生又指出：“秦國字形固近於大篆，而齊、吳、楚與秦尚無大差異，獨欒書缶異體較多，與其它晉器不同。”（見《殷周青銅器通論》第九六、九七頁）已經指出銘文史實和字體的矛盾。近年隨著楚地出土文物激增，鑒於缶的器形和文字與楚地出土文物十分接近，故有學者認為，該缶應是欒書的後人“書也”在楚地所造。這是對此缶形式上具有楚的風格而內容涉及晉事這一矛盾現象所作的一種新的合理的解釋（參甌燕、王冠英文，《文物》一九九〇年十二期）。而李學勤先生則以為作器者的“竊書”並非晉的欒氏，而是蠻氏後裔之在楚者（見《竊書缶釋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四年）。

其三，先生南歸後在廣州僅得一陳侯午敦，器作半球狀，兩環為耳，三環為足；失蓋。銘八行三十八字：“唯十年，陳侯午朝羣邦諸侯于齊，諸侯享以吉金，用作平壽造器敦，以登以嘗，保有齊邦，永世毋忘。”銘在器內。陳侯午即田和代齊的第二代齊桓公午。同人所作之器有三，色澤相同，殆為乾隆年間同坑所出，不知何故流入嶺南。

（四）以編纂叢帖書畫為工具的目錄學

先生南歸後於教學之餘，仍繼續從事古文字和古銅器的研究工作，著有《甲骨學概況》、《殷周青銅器通論》、《弭叔簋及匍簋考釋的商榷》、《清代吉金書籍述評》等，與此同時，還對若干舊作加以修訂和補充。如第三、四版《金文編》，《宋代吉金書籍述評》，《鳥書考》等，都是在舊作的基礎上踵事增華而成的。

容庚先生還是我國屈指可數的著名碑帖書畫鑒賞家和收藏家，先生曾說他自己有兩個癖好：一是金石，二是書畫。金石得之於舅氏鄧爾雅先生，而書畫則得之於從叔容祖椿先生。先生對於

書畫原來就有很濃厚的興趣，因為有感於《列子》“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的話，故於金石文字之外，不敢多所旁鶩。先生南歸之後，由於南方有關青銅器銘文的資料十分匱缺，甚至連求一個拓墨的人也不容易，苦無用武之地。於是便把注意力逐漸轉移到碑帖書畫方面來。這一時期，先生無論對竹譜的研究，對倪瓚畫的研究，對飛白書的研究，以及對淳化閣和澄清堂法帖的研究等，都有很深的造詣。六十年代以後，先生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叢帖目》、《歷代名畫著錄目》和《頌齋所藏所見書畫小記》這三部巨型工具書的輯集上，即使在十年動亂身處逆境之中，也從未間斷過。

《叢帖目》以自藏及目見一卷以上之叢帖為主，合得三百一十餘種，分歷代、斷代、個人、雜類和附錄五類，共二十卷，一百多萬字。先生在序言中詳述叢帖之難得，子目之難編，分合之難定，真偽之難辨，備嘗此中甘苦。此書由中華書局香港分局於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六年分四冊出版，為習書法、言鑒別者必備之書。

《頌齋所藏所見書畫小記》是容先生數十年慘淡經營的一部著作。先生自幼受外祖父的影響，欲合譜錄、收藏、傳記三者於一書，故頗致力於傳世和當代書畫的收集。先生謂“書畫大家人所共仰，而財力所限，未能盡得”。故先生不收大家而取其冷僻者，不收紙本而取其綾絹者，不收立軸而取其卷冊者。且以學術的眼光，喜收世家及其弟子之書畫，連類而及，可以互證；喜收文人之作，讀其所著書因求其書畫，得其書畫因求其所著書。並兼收詩翰、尺牘、書扇、楹帖等。篋衍漸豐，進而求之法帖、印鑑和著錄，探其真偽。計收自唐代至現代書畫作品八百餘家，略仿《中州集》之例，以畫繫人，以人繫傳，陸續增訂，都一百五十多萬字。在全集未有條件出版之前，由先生的女兒容璞教授（廣州美術學院）加以整理、選輯，取其中二百多家，編為《頌齋書畫小記》手稿本選集，先行問世，於二〇〇〇年四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歷代名畫著錄目》是先生另一部大型的目錄工具書。一九四三年沈凡遜為福開森編纂《歷代著錄畫目》，先生手得一部，三十多年反復翻閱，發現錯誤不少，隨時為之訂正。一是補缺。計補缺《著錄畫目》引書一百三十種；復陸續增補書籍，共得一百五

十種,中有不少難得的手抄本。二是正誤。先生每得一張名畫,必先核對《著錄畫目》,發現沈周名下失收《鐵網珊瑚》以下十三種書,三百一十四條畫目;又以《甌鉢羅室書畫過目錄》增訂本校原刻本,《著錄畫目》失收盛琳以下四百零四人。其它小誤還有八項。三是刪繁。《著錄畫目》所收祇存名目而略無說明者居多,再三重複,徒增篇幅,計有五項必須刪繁就簡。因而,先生為研究歷代名畫而改編《著錄畫目》為《歷代名畫著錄目》,所錄畫家二千多人,畫目共五萬多條,這對於研究歷代名畫的變遷,查找某一畫家的作品,或者辨別某一張畫的真偽,都是有所幫助的。可惜這一百多萬字的著作至今還沒有機會出版。

治學特點

容庚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學問淵博的大學者。容先生之所以能在多個學術領域中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是同他做學問的精神和做學問的方法分不開的。從治學的角度來考察,不難發現容庚先生確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先生強調“目錄是治學的階梯”。先生認為,做學問的人,為了研究某個課題,祇靠平日博聞強記是不夠的,必須借助“目錄”一類的工具書,纔能綜觀全局,循序漸進,逐步達致學術的顛峰。先生少年自學《說文》,即得力於黎永椿的《說文通檢》;其後研治金文,又獲益於王國維的《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二書。但先生對於目錄書籍並不限於使用,而是在使用中發現問題,加以訂正和校補。先生前後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大有裨於學者。甚至加以重訂或改編,如先生繼改訂王國維的《宋代金文著錄表》後,又自編《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而晚年完成的《叢帖目》和《歷代名畫著錄目》二書,更是熔目錄與學術於一爐的力作,其意義更遠在目錄、索引之上的。

其次,先生主張“以原材料為治學之根本”。先生認為,治學切忌浮夸之言,無根之論。而要做到言之有物,就必須詳細地占有第一手資料,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故先生始終以收集

原始材料爲第一要務。這裡舉幾個例子：一、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先生即傾注全部心力收集金石書錄，每月以薪酬的一半購置金石圖籍。南歸時家藏圖書多至二百多箱，號稱“五千卷金石書室”。先生撰寫大量金石研究的論著，主要是取材於此的。二、一九二五年《金文編》初版印成後，先生即著手編撰以秦漢金文爲對象的《金文續編》，雖三易其稿，仍感材料不足，於是先生不得不再回過頭來先編《秦漢金文錄》，爲《金文續編》做好材料上的準備。先生在《秦漢金文錄》的“序言”中，備述收集、鑒別、整理金文材料的困難，讀之發人深省。三、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傳世法帖不爲時尚，甚至有用來做爆竹原料的，先生慧眼獨具，視法帖如同拱璧，舟車南北，廣爲購求，共得二百二十餘種，居國內公私藏家之冠。先生四大冊的《叢帖目》，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寫成的。先生收藏以金石、考古和書畫、叢帖最具特色，自成體系，正與先生的治學互爲表裏。經過先生辛勤羅集、精心鑒別和科學整理的原始材料，不但爲自己的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也爲並世學者和後來者提供了大量翔實可靠的素材，其對學術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先生堅持“以考據爲治學的手段”。先生認爲，文字之學非同玄想，必須依靠大量的參考書，積累足夠的證據，纔能有所作爲。先生對於未識之字的考釋，對於器物真偽的鑒別，對於歷史年代的推斷，無一不是根據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相互推斷和驗證而得出結論的。力求做到“言之有據”、“信而有徵”。例如對鳥蟲書“戊王”二字的釋讀，對西清金文真偽的判定，對晉侯平戎盤字體仿自散盤的論斷，以及對倪瓚畫真、疑、偽三者的釐定等，都是經過遠搜近討，反復論證，然後纔審慎地作出結論的。在《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這篇著名的長篇論文中，先生別開生面地採用“考據法”以治文學。文中詳細比較《列朝詩集》與《明詩綜》這兩部詩集的異同與優劣，理論堅實，論證充分，言之鑿鑿，非一般以詞藻品評者所可比擬。值得指出的是，先生對考據學的運用態度特別嚴謹，他在《金文編·序》中寫道：“吾聞之韓非子曰：‘無參證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審釋文字，余唯愚與誣是懼。”先生無論爲文考字，言必有據，據必參驗，有所不知，則付諸闕如，不敢掉以輕心。可見先生矜慎不苟的嚴謹學風，是同他